

#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

张 涛 李均超

---

**【摘 要】**新发展理念是治国理政方面的重大创新成果，直指国家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天然”联系，对新阶段下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存在现实难题待解、城乡区域差距仍是制约社会包容性的重要因素、区域协同减污降碳能力尚有欠缺以及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面临新挑战等方面。因此，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数实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构建更安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新发展理念 现代化经济体系 对外开放体系

**【作者简介】**张涛，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均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4) 03 - 0018 - 15

---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

---

\* 本文系“2022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社科类重大项目培育专项”（校20220080）的阶段性成果。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sup>①</sup> 中国正处于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新阶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重道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sup>②</sup> 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对国内外形势突变做出的科学判断，更是新阶段下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的重要抓手。<sup>③</sup> 只有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和理论创新，才能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 一、新发展理念的理論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换挡期，如何从理论创新入手，找到全新发展模式和指导理念来缓释内外压力，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新发展理念”，为新时代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新方向，标志着中国治国理政方针进入了全新境界。

### （一）理论内涵之新

新发展理念系统全面回答了新时代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实现发展的重大问题，蕴含丰富内涵和理论精髓。在创新发展方面，新发展理念要求将创新驱动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和全过程，持续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科技创新，并且面向国家重点需求，以基础技术、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突破作为产业提质增量和经济内生动力转换的关键；在协调发展方面，新发展理念要求树立大局观，以统筹兼顾的原则平衡好东部与西部、城市与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促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联动，确保国家发展行稳致远；在绿色发展方面，新发展理念要求经济发展严守生态功能保障底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三大红线”，摒弃“唯 GDP 论英雄”的粗放型生产模式，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努力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开放发展方面，新发展理念要求

---

① 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 习近平：《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求是》2022年第16期，第4页。

③ 参见张涛、姚慧芹：《新发展理念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河北学刊》2019年第3期，第123~127页。

中国在国际商贸交往中遵循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发展逻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地参与全球化分工与合作，提升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控制和整合力度，在培育和巩固外贸优势的基础上提升中国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在共享发展方面，新发展理念要求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强调人民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创造者和共享者，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充分提升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获得感，彰显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 （二）方法论之新

新发展理念支撑中国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各种挑战接踵而至的形势下取得历史性成就，体现了方法论体系的科学性。新发展理念坚持发展思维，强调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新发展理念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内含对中国现阶段发展和内外环境变化的多维度考察，是中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迎难而上的“定心针”，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长久生命力。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思维，是对传统经济实践规律、成果提炼升华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sup>①</sup> 五大发展理念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分别揭示了创新驱动发展规律、经济结构规律、可持续发展规律、经济全球化规律以及共同富裕规律，同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结合，系统总结和回答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问题。<sup>②</sup> 新发展理念坚持辩证思维，统筹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该理念体系在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国际“竞争优势”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发挥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在注重居民“物质需求”满足的同时，又提倡“精神文明”的提升；在致力于实现“富裕价值”的同时，也主张发挥生态环境的“绿色价值”；在重视国内“主场”地位的同时，并不否认国外“客场”的重要性；在追求全体人民“普惠”发展的同时，对地区教育、医疗、养老领域的“特惠”政策也给予支持。

## （三）价值取向之新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探索的经验升华，在中国迈入更高发展阶段时表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新发展理念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

<sup>①</sup> 参见顾海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开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第23~30页。

<sup>②</sup> 参见黄群慧：《新发展理念：一个关于发展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8期，第13~24页。

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sup>①</sup> 新发展理念将人民立场鲜明地囊括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中，在价值目标、依靠对象以及发展内容等方面贯穿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sup>②</sup>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在全过程的实践中不断理解和完善人民民主制度，进而适应不断发展的经济实践和人民需求。从人民主权到多党合作，从民族自治到基层民主，无不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层面的相互衔接和制度合力。<sup>③</sup> 新发展理念体现以问题为导向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对内面临经济转型、减污降碳、城乡协调等巨大压力，对外面临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经济逆全球化影响加剧等突出问题。党和政府在事关中国发展大局的重要领域运用哲学思维厘清和处理当前挑战与重要战略机遇之间的关系，是应对新形势、植根新基础、解决新问题、完成新任务的生动诠释，体现出强烈的问题导向。<sup>④</sup> 新发展理念坚持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sup>⑤</sup> 中国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须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未改变，重点领域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同时，国际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导致世界进入剧烈动荡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sup>⑥</sup> 表明了中国将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态度。

## 二、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系

纵观史实，中国发展是一个从落后到先进、不断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

---

①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79页。

② 参见杨根乔：《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第93~99页。

③ 参见柴宝勇：《坚定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5期，第11~13页。

④ 参见向征：《新发展理念的哲学智慧》，《人民论坛》2017年第7期，第86~87页。

⑤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生产力的过程，发展模式和指导理念若不能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则会阻碍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新阶段，中国式现代化亟待解决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问题，需要新的发展理念去引领。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sup>①</sup>这是新时代中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能够为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因此，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式现代化存在“天然”的联系。

从理论层面来看，“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sup>②</sup>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经济、政治、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观和现代化观，<sup>③</sup>其内在要求直指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五大特征和挑战。创新发展立足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实，旨在以创新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协调发展旨在统筹人与物的全面发展，引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取向；绿色发展旨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环境载体和绿色根基；开放发展旨在要求中国走和平发展的国际化道路，为人类现代化提供更多方案和选择；共享发展旨在实现共同富裕，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旨在立足中国客观现实，解决现代化道路中的突出问题，需要匹配“质”与“量”融合的科学发展方式。新发展理念则阐明了新时代下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问题，以创造美好生活为实践目标，<sup>④</sup>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动力变革、共同富裕、环境保护、国际交往等问题上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战略举措，力求减少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并强化新阶段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各方面的联系，相较西方单一目标的线性发展思维具有很大优势。同时，新发展理念深化了对人类发展规律的全面认识，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发展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和实际应用，<sup>⑤</sup>其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独立自主以及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理论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内容和基本立场不谋而合，深化了新阶段下中

①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86~487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6页。

③ 参见黄群慧：《新发展理念：一个关于发展的系统的理论体系》，《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8期，第13~24页。

④ 参见项久雨：《新发展理念与美好生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第39~47页。

⑤ 参见顾海良：《新发展理念的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意义》，《经济研究》2017年第11期，第15~17页。

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涵意蕴。

从实践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进入具有关键意义的过渡期，同时也是多重矛盾的集中爆发期，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问题不断显现，早期发展过快带来的隐患逐步显性化，促使中国进入“问题倒逼”的发展进程，而新发展理念围绕经济社会核心问题，致力于引导中国走上健康、安全、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分别对应一种具体的发展模式，并指向现代化建设的具体领域，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在建设环境更加多变、苛刻、复杂的背景下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整体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新发展理念为依托，党中央接连部署了包括扩大内需、区域协调、东数西算、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国家重点战略，形成了系统协调、层次鲜明、紧密联系、支撑有力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体系，在取得历史性伟大成果的同时，为后续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客观基础和现实指导。近代以来，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指引下，不仅没有顺利实现现代化，反而产生诸多社会问题，这与新发展理念支撑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突出成就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长期坚持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推进现代化建设，这有赖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下最符合中国经济体系建设本质要求、最能体现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sup>①</sup>新发展理念引领下的新发展格局顺应了中国调整经济结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的变革实践，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从历史层面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要“把社会看做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sup>②</sup>随着时代特征和社会形态的演变，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和核心任务有所调整，发展理念和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也在不断更新。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秉承了与时俱进、去伪存真、开放包容的理论创新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

<sup>①</sup> 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22页。

<sup>②</sup>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sup>①</sup> 新发展理念与中国历代共产党人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sup>②</sup> 立足于中国具体实践，摒弃历史虚无主义和本本主义，推陈出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的再次飞跃。同时，新发展理念坚持洋为中用，在批判西方经济学中带有资本主义制度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内容的同时，借鉴和吸收了其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有益成分。新发展理念融合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常态、新矛盾、新格局、新阶段的重要论断，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思想，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观大势”规律，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外部环境和时代特征，为现阶段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决策依据。中国发展迈入“强国”阶段，相较西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更注重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以及经济成果广泛共享，有利于跳出西方理论束缚和发展陷阱，是中国应对未来发展挑战、明确未来建设方向的行动指南。可以看出，新发展理念及其指导的实践，处处显示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提，使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基于新的历史起点，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新内涵。另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表现为物质、精神、社会、生态文明的进步和演化，但最终落脚于人的自身发展和自我满足的价值需要。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发展模式以人的需求和利益为核心，旨在实现人平等、合理、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产和发展过程，倡导建设一个人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潜力的社会。新发展理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价值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 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现实挑战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须辅以强劲的经济根基、政治根基、生态根基以及社会根基，涉及全社会的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综合改造。总体来看，当下中国现代化建设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② 参见张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及测度方法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第23~43页。

面临的现实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存在现实难题待解

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物质基础和重要支撑。“只有形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更好顺应现代化发展潮流和赢得国际竞争主动，也才能为其他领域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sup>①</sup>然而，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仍存在现实难题亟待解决。其一，创新动能尚未完全形成，实体产业增长动力不足。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大幅提升，但研发强度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根据 OECD 数据库，2021 年中国（除却台湾省）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为 2.4%，虽已接近 OECD 国家总体水平（2.7%），但明显低于美国（3.5%）、德国（3.1%）、日本（3.3%）、韩国（4.9%）、瑞典（3.4%）、瑞士（3.4%）等发达国家。人力资本也面临结构性矛盾，中国每千名雇佣者中研究人员数仅为 3.2，低于日本（10.3）和韩国（17.3）。<sup>②</sup>同时，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征也使企业更加注重符合市场需求的应用型研发，难以支撑产业共性技术突破，实体产业发展步伐趋缓。其二，要素配置存在扭曲，三大产业转型压力较大。乡村人口迁徙导致劳动力出现“空白”，加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农牧活动精准管控水平不高，使农村农业现代化推进困难。制造业软硬件条件欠佳，使数字技术在各环节上的嵌入和赋能水平不高，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2 年中国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仅为 24.0%，供给端数字化赋能尚未规模化展开。<sup>③</sup>服务业内部结构不合理，现代服务业占比偏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集群水平不高，加之行业行政管理体制不畅导致政策落实困难和实施效果滞后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利于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其三，数字监管相对滞后，风险资本无序扩张。网络基础设施和新一代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平台企业掌握了相当的规则制定权，通过技术垄断、算法合谋、价格歧视等手段强化市场势力，而且行业特有的“网络效应”和“赢者通吃”属性自主强化了头部企业的垄断地位，形成了以用户和数据为支撑的垄断性生态圈，挑战了原有垄断界定和反垄断框架，以扩张市场和提高平台估值为目的的风险资本更是促使部分互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 年 2 月 1 日。

② 参见 Gross Domestic Spending on R&D, OECD Data, <https://data.oecd.org/rd/gross-domestic-spending-on-r-d.htm>, 2023 年 7 月 8 日；Researchers, OECD Data, <https://data.oecd.org/rd/researchers.htm>, 2023 年 7 月 8 日。

③ 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 年）》，[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 2023 年 7 月 8 日。

联网平台成为金融资本增殖的工具,<sup>①</sup>加剧了经济体系“脱实向虚”的风险。

## (二) 城乡区域差距仍是制约社会包容性的重要因素

践行包容性增长路径事关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20世纪以来形成的沿海开放格局和重工业优先发展路径在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间接引致了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国家政策调控下区域协调性虽有所增强,<sup>②</sup>但近些年南北地区分化、农村“空心化”、种粮人“青黄不接”等问题的不断显现,标志着发展不平衡难题仍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关键问题。在财富分配方面,中国收入分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高于国际警戒线水平,<sup>③</sup>行业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较为明显。究其原因,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较低,税收和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和覆盖范围存在局限,民间慈善、社会捐赠的激励机制和保障体系不完善,加之垄断行业部门存在隐性高收入,使贫富分化进一步拉大。<sup>④</sup>在财富获取方面,长期以来区域教育资源和就业岗位的倾斜,使劳动力市场不合理用工和就业歧视现象仍然存在,<sup>⑤</sup>削弱了底层群众的个人发展动力。欠发达地区资源供给、金融服务以及产业化建设的相对薄弱,制约着优质创业项目的引进与落地,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另外,农村基础设施、医疗卫生资源以及基本教育服务供给较现代化需求仍显不足,供给质量有待提升,而且伴随青壮年人口外出流动,公共服务结构存在供需偏差。现阶段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政府为主,供给主体的单一性和财政支持的相对不足使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提升困难、专业化和多元化推进缓慢,缺乏自身提升动力。<sup>⑥</sup>

① 参见刘震、蔡之驥:《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互联网平台经济的金融化》,《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4期,第180~192页。

② 参见魏后凯、年猛、李玢:《“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第5~22页。

③ 参见孙豪、曹肖焯:《收入分配制度协调与促进共同富裕路径》,《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年第4期,第3~24页。

④ 参见罗明忠、邱海兰:《收入分配视域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思路与路径选择》,《求索》2021年第2期,第172~179页。

⑤ 参见王燊成:《揭开未就业的面纱:城镇贫困人口的就业障碍及其政策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7期,第74~90页。

⑥ 参见李现丽:《着力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农业经济》2022年第6期,第30~32页。

### （三）区域协同减污降碳能力尚有欠缺

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sup>①</sup>目前中国区域环境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协同性不足，直接制约减污降碳的步伐。其一，减污降碳协同治理制度亟待强化。以排污许可为核心的减污制度多针对生产场所相对固定的工矿企业，主张从污染源头进行监管，相比之下，碳减排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结构降碳、工程降碳，强调源头防控、过程控制以及责任追究，二者的监管对象和作用环节有所不同。如何促进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实现二者制度的衔接，目前中国还处于试点探索阶段，部分省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尚未正式确立。<sup>②</sup>其二，区域协同降碳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处于推进“四化”的中高速发展时期，可以预见能源消费和碳排放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如何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可回避的问题。另外，区域产业结构不平衡、资源禀赋不充分的问题，使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碳排放特征和减排压力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影响了生态要素流动和绿色价值实现。<sup>③</sup>如何结合区域发展特点，践行差异化的碳达峰路径，融入全国降碳大局，是未来区域协同降碳的重大议题。其三，碳管理相关立法尚不健全。中国能源需求依然旺盛，“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使中国难以减轻对煤炭的依赖。然而，中国现有法律多从环境保护和能源利用视角提出，碳排放管理缺乏相应的上位法律依据，监管部门、工作机制、事权划分、考核标准的不明确导致地方政府落实“碳减排”的措施缺乏强制力和可操作性，降低了工业、能源等领域的碳管理效率。<sup>④</sup>

### （四）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面临新挑战

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实现内外循环高效联动的重要举措。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② 参见中国财科院“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财政政策研究”协作课题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财政政策研究》，《财政科学》2023年第3期，第60~66页。

③ 参见张友国：《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释义与路径探索》，《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年第7期，第9~17页。

④ 参见李猛：《新发展理念：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法论创新》，《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第63~69页。

叠加等多重挑战，中国构建更安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体系面临新挑战。其一，区域开放格局有待进一步优化。中国对外开放历来具有“东强西弱、南强北弱”的特点，非均衡的开放模式限制了对外开放体系的整体布局，导致资源和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不高。现有自贸区建设在制度改革创新方面存在不足，招商思路也多停留在依靠土地招拍挂、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的层面上，加之部分地区存在招商引资和产业集聚的客观困难，导致短期内难以形成有上下游形态的产业链和相对成规模的产业集群。<sup>①</sup>其二，产业开放层次偏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不强。中国金融业、医疗业、服务业等在外资持股比例、跨境资本活动以及董事成员身份等方面存在诸多制度性限制，服务贸易的结构失衡和国际竞争力不强也极大限制了优质资源供给，恶化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对行业开放形成较大压力。<sup>②</sup>其三，产业链、供应链面临安全稳定风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凭借自身的研发优势，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较强的不可替代性。中国虽凭借巨大市场潜力在国际分工中获得部分收益，但产业体系、技术研发的“大而不强”导致中国参与产业分工时相对被动，而且中美关系已转向长期战略性竞争关系，技术霸权使中国产业发展面临“低端锁定”，<sup>③</sup>产业链、供应链也面临安全风险。特别是中国作为天然气和石油消费大国，外采率高且供应主体相对单一，世纪疫情和俄乌冲突的叠加进一步加大中国从国际市场上获取能源的难度，不利于国内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

#### 四、新发展理念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当前，现代化内涵已逐步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方面。对此，应深刻领会和善用新发展理念的前瞻性、系统性、全局性思维，结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瓶颈约束和核心挑战，探索和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和方法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走深走实。

##### （一）坚持创新发展，以“数实融合”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中国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根本之策。当

<sup>①</sup> 参见裴长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周年：基本经验和提升战略》，《财贸经济》2023年第7期，第5~21页。

<sup>②</sup> 参见太平、李姣：《中国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困境与突破》，《国际贸易》2022年第6期，第13~19页。

<sup>③</sup> 参见徐金海、夏杰长：《全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3年第11期，第48~63页。

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其天生自带的创新基因靶向瞄准科学技术的自立自强，为实体行业发展蓄势储能，对中国经济实现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具有重大意义。目前，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面临实体行业创新、转型动力不足和数字监管滞后的困境，应把握数字赋能重大机遇，明确数字经济规范与健康发展并举的共识，构建“以数强实”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一要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技术创新释放数字时代生产力。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聚焦5G、大数据、量子通信、应用卫星、集成电路芯片等核心前沿技术，明确不同层次实体企业在数字创新链中的主体定位，形成以“大”带“小”、以“上”促“下”、由“内”而“外”的协同创新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原创性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完善，实现数字技术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全领域覆盖，从研发设计到生产运营全流程应用。同时，提倡产教融合、产学研合作新模式，改变以往对专科职业培训的刻板印象，注重掌握数字应用技能的专业人才和综合性人才培养，并着力消除社会投资流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企业转型的阻碍，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的投融资格局。二要推动企业组织模式创新，以数字化平台重塑企业管理和服务架构。推动企业平台化转型，扩大已有组织边界，构建“平台+实体”的服务生态系统，引导服务业务并联式发展。强化数据要素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数据贯通和智能分析能力，使平台成为企业衔接更多客户、资源的枢纽，并以此为底座不断进行产品服务创新。三要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引导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改变以往仅依据市场份额判断垄断地位的认知，综合考虑数字企业是否存在滥用算法、数据以及平台规则来限制竞争的行为。明确划分数据资源在公共、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层面上的管理边界，严格规范公共基础数据和个人隐私数据的私有化使用及跨境存储等问题。打造政府与社会、媒体的数字监督互动平台，增强监管效益，建设多元共治的数字平台治理体系，使新业态发展能够在法律框架之内有序展开。同时，要坚持中性监管，避免受到社会舆论的过度干扰，还要努力破解数字企业“成长中的烦恼”，适度保障相关企业的超额收益，满足其转型和新业务发展需要。

## （二）坚持协调发展，着力推动城乡融合与区域协调

协调是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必然应对。“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sup>①</sup>应基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优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同治理关系，推动城乡区域包容增长，真正践行协调发展理念。

一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城市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引导城市资源“下沉”。大力发展县域经济，鼓励乡镇凭借自身特色承接产业链部分环节，以价值链的衔接与延伸打造城乡产业梯度布局，促进区域要素互流和市场对接，并以产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扩散带动农村信息化、城镇化发展，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二要以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释放区域潜力。各区域应立足自身优势，践行错位竞争路径，分阶段、分层次、分行业逐步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具体来说，作为诸多领域的改革阵地，东部地区应遵循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速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变，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有效发挥国民经济的动力引擎作用。中西部地区仍要以实体经济为发展重心，继续加大投入和改革力度，着力发挥地区传统产业的特色优势，并以新技术、新模式完善农业和制造业现代化体系，破解产业同构发展障碍，蓄力培养新市场和增长点。三要加快推进区域基础服务和创收机会均等化。全面推进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补齐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发展短板，缩小区域公共服务差距。同时，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拓宽不同人群的就业和创收渠道，进一步完善新型就业形态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

### （三）坚持绿色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这一基本国策的深刻诠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sup>②</sup>目前，中国减污降碳之路的阻碍主要体现在立法、制度以及区域间政策的不协同、不长效导致的“合成谬误”。要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强化全国一盘棋意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一要发挥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加强“排污权”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完善空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协同控制的评价和治理体系，采用减污降碳双驱动模式，从总量设置、配额核定、交易平台以及监管审查等诸多方面实施政策协同管理，提高综合治理效率。二要深化区域减污降碳联防联控机制。既要坚持精准治理，锁定减污降碳的重点地区、重点时

<sup>①</sup>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sup>②</sup> 《习近平总书记论生态文明建设》，《人民日报》2017年8月4日。

段、重点行业，又要构建区域大气环境共建共治体系，围绕二氧化碳和大气污染物潜在排放和泄露问题，开展联保联治、联动执法，推进邻近省市减污降碳合作专项行动和排放清单动态管理，破解省界“邻避问题”。三要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体系整合和功能提升。对以《环境保护法》为代表的根本法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治理原则以及关联性条款进行适当修订，补齐关于碳减排和碳汇的专门规定，明确各地区、部门、行业的阶段性碳减排任务，强化约束力和可执行性，并基于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的同根同源性进行系统性规则立法，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基础性与配套性要求做出明确规定，推动“一证式”管理，设置减污降碳协同防控和监督部门，完善生态环境职能部门体系。

#### （四）坚持开放发展，构建更安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更安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既有利于打通各生产环节堵点，促进供给侧深层次改革，为国内大循环提供保障，又能广泛利用全球优质要素资源，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从而实现我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目前，促进区域资源要素布局优化、提升产业开放质效、加强国际合作，是我国构建更安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关键举措。

一要推动区域开放格局由“梯度开放”向“均衡开放”转变。进一步巩固东部地区的开放前沿地位，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加对全球要素的吸引力，推动产业分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依托新一代数字技术打造世界先进产业集群。同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放步伐，基于地区资源禀赋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建设对外陆海通道，培育新的经济开放增长极。二要推动外贸合作由“量变”向“质变”转化。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在巩固贸易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加快外贸产业结构调整 and 业务流程再造，实现外贸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并推动跨境电商、数据交易等贸易新业态的发展，积极探索和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为全球经贸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三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向多元稳定转变。优化利用外资环境，在优质项目引入、沟通反馈以及规划用地等方面落实稳外资政策措施。在巩固和增强与欧盟、日本、韩国产业链联系的基础上，构建“中国+X”的产业链模式，依托产业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掌握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

主动权，加大对国际新兴市场的探索力度，寻求渐进可控、包容共生的合作新路径。

#### **（五）坚持共享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中国已历史性地消除了绝对贫困，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幅下降，区域整体减贫效果明显，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所优化，但仍面临劳动收入占比较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足、行业收入差距明显等问题，须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创新为突破口，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保证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一要健全初次收入分配制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鼓励多种要素协同参与经济生产，完善要素贡献分配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限制过高资产性收入，并通过最低生活保障和惠农支农政策等措施调整就业弱势群体的生活收入。重视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合理简化潜力型中小微企业研发投资的前置性审批流程，打造多层级企业行政服务对接平台，并推动完善相关担保机构，增强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和便利性。二要持续发挥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再分配作用。基于财富获取方式，合理调整税基和税率，以针对性财税制度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积极引导国家转移支付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倾斜，提高政府对发展周期较长的潜力企业的资助有效性和针对性，推动缩小各行业的收入差距。协同制定产业发展与创业扶持政策，引导人才、技术、资金合理配置，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提升社会创业活跃度。三要着力完善第三次分配制度。积极开展志愿公益和慈善募捐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浓厚慈善氛围，壮大社会公益队伍和募捐主体。推动捐赠模式变革，将非货币性的“无形财富”纳入第三次分配的对象，拓展志愿服务路径、范围和实现形式。加强社会捐赠的制度性建设，规范相关审批和准入规则，进一步健全慈善资金管理监管机制，谨防慈善资金乱用、误用。

（责任编辑：任朝旺 李润东）